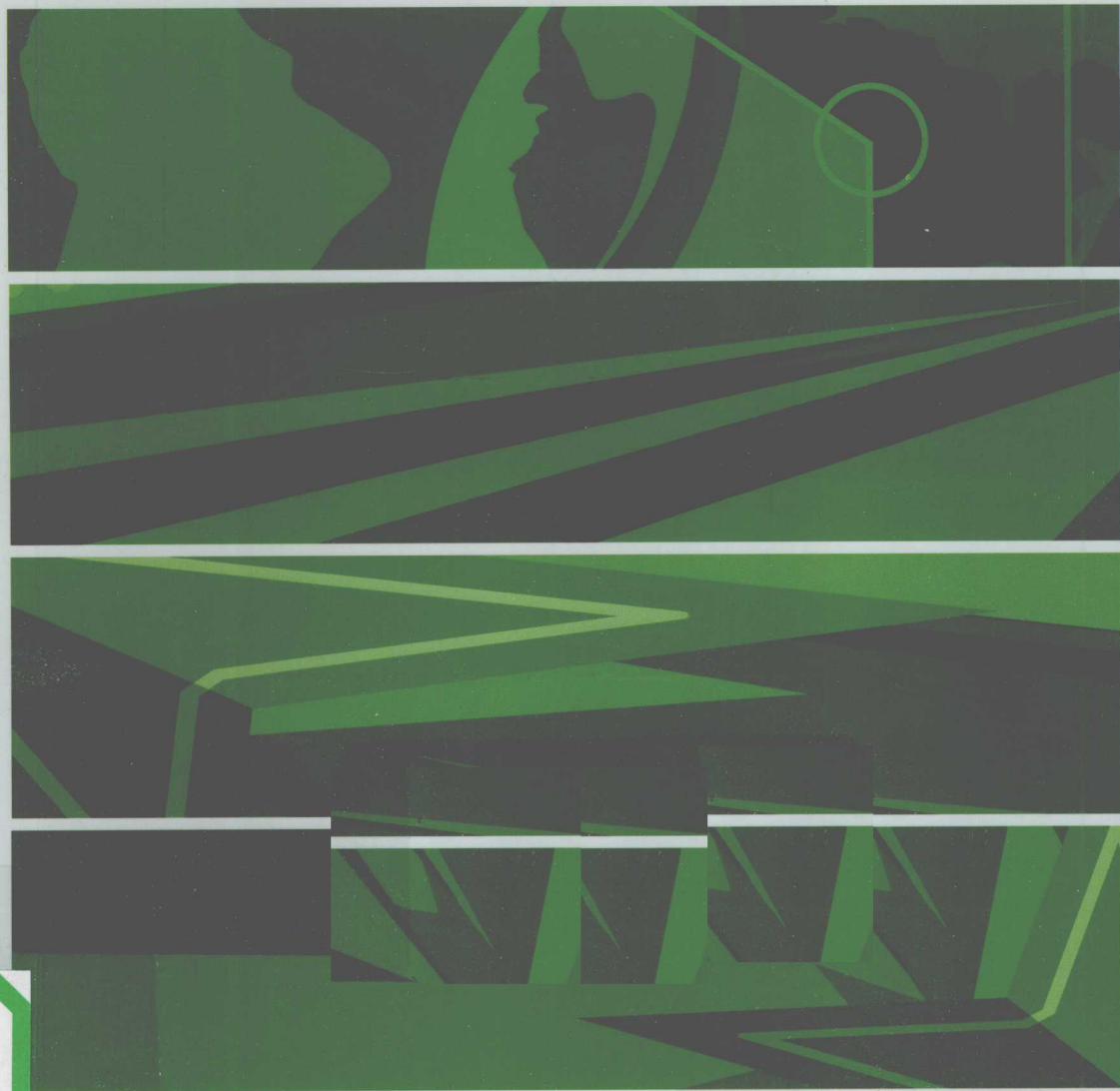


·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

MARK POSTER



互联网怎么了？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INTERNET?

[美] 马克·波斯特 / 著
易 容 /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HULIANWANG ZENME LE

互联网怎么了？

马克·波斯特 著

易 容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10—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互联网怎么了?/[美]马克·波斯特著;易容译.一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4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主编 马 驰)

ISBN 978-7-5649-0142-4

I. ①互… II. ①波…②易… III. ①互联网络—社会影响—研究 IV. ①C913②TP3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4528 号

Mark Poster: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Internet?* (Electronic mediations; v. 3)

Copyright © 2001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书 名 互联网怎么了?

著作责任者 [美]马克·波斯特 著 易 容 译

责任编辑 靳开川

责任校对 子 玥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地质彩色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05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在一种新的虚拟结构(图景)中,一名正统的犹太人将手机贴着他们的圣地——哭墙,以便让一个远方的朋友进行祷告。利娜·卡斯特诺娃(Rina Castelnovo)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图片。授权使用。

致 谢

书虽然署的是作者的名字,但其实是某个领域内许多学者愉快合作的成果。许多人对我的书中的章节提出了看法——有人听取了我的陈述,提出了问题。我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同事,尤其是批判理论研究所的同事,在一种非同寻常的大学氛围中,仔细审读了我的作品;1997年加州大学人文研究所的“媒介与国家”学术研讨会,凯瑟琳·海勒斯给我提出了大量不失犀利的修改建议,其中有些建议使我免犯离奇的错误;我的编辑道格拉斯·阿曼托、萨缪尔·韦伯、我的朋友琼·维纳,他充分阅读了我的作品,并给予了评论;最后还有阿内特·辛利特,他带着热情的心和无情的批判眼光阅读了这些书页——对此,我受益良多。

译者序

易容

亲爱的读者：

奉献于你们手中的这本译著是一本聚焦于讨论当代人类的高科技通信载体——“Internet”(互联网)的诞生、发展及其如何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颠覆性的变化的文化理论著作。作者是当今西方著名的文化学理论家马克·波斯特，生于1941年，1968年获得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系和电影与传播学系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并同时受聘于该校信息科学院和比较文学系。

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马克·波斯特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西方文化思想史、文化批判理论、新媒体研究等。在这本书里，他与你就像朋友那样交流、探讨那些关于咱们当今的网络世界“赛博空间”(Cyberspace)究竟怎么了、还会怎么样等一系列深刻的、极具智慧启发性的人类文化学话题。

“狼”来了！马克·波斯特，这位文化批判理论学者，当代西方最早系统地关注和研究网络新媒体的“领头羊”，怀着似乎迎接新世纪第一缕朝晖的期待、喜悦的心情向我们通报：狼终于来了——来自互联网虚拟空间的文化巨兽。

在这部著作里，他首先通过第一章《文化的不确定性》，揭示了“赛博空间”这只巨兽，将对当下整个现实世界的人类文化一口吞食的动向。诸如：你过去已有的价值观念被解构；你苦心孤诣营造的体

系研究总是不得要领；更有甚者，过去处于庞大文化体系中心地位的权威思想理论遭到空前“恶搞”；而在这个魔幻般的“赛博空间”里，种族“文化”绝对失去它们固有的疆界已成为事实；边缘文化甚至是难民营文化成了其他群体在文化上的楷模等等。总之，在学术领域“过去被认为坚不可摧的文化概念如同经历了其后果不可估量的地震一样动摇了。”（作者语）

重要的是，马克·波斯特以其长期研究媒介文化的敏锐目光和批判学者深邃博大的学术背景，早在本世纪初，就用他的睿思锐眼预告了我们当下这些光怪陆离的库索文化、闪客文化、博客文化、播客文化、彩客文化、晒客文化……这一切日益让我们在固有的文化秩序里有点儿“找不着北”的网络现象。

接着，在他本书以下各章里，立足于当下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新媒介与文化信息载体——“互联网”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关注与思考：从人类当今物质生活的数字化生存、社会各民族文化的根本文化转型、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高科技现象和文化消费现象，到互联网大环境下的个人、民族和种族……总而言之，咱们人类该如何进行有效交流、沟通等等；从普遍文化现象到沟通交流的“疑难杂症”；从对新锐前沿学术理论的梳理和介绍，到对未来全球化文化秩序的崭新构建；作者既有敏锐及时开阔的关注视野，又具备系统思考、严谨分析与论证的学术理论框架。

尤其具有启发价值的是，在书中的第四章《数字化主体与文化理论》和第九章《网络民主：互联网是一个公共空间？》的讨论中，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前瞻性和心态包容地认识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因为互联网所特别具有的，对几千年人类文化固有模式和秩序的巨大颠覆和整合力量，将促使和推动着人类文化、文明迈向不可思议的重构新纪元的可能性。

在他的文章中，媒介不仅具有一种物质性的进化意义，而且成为一种划分文化时代的标志。有的思考还充满了历史的厚重和哲学的思辨。哲学、历史、媒介，这三个看似不相干的学科，在他研讨的进程

里形成了关乎人类自我发展的主题。诚然,不可否认,马克·波斯特对新媒介文化的探讨在理论上涉及和关注的路径还是显得庞杂,他的思想触角十分时尚,又非常跳跃地伸向四面八方。还有,他对前人的一些理论资料的旁征博引,对文化现象、问题引发的议论,思路跳跃性较大,这样难免在有的结论上出现偏激。但是,他对当今全球化政治、宗教、民族问题和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其批判的锋芒总是难掩他一贯所持的理解和包容的治学作风。

在译者3年前经历了整整1年时间的翻译和反复修订,又经过相对漫长、近乎无望的期盼付梓出版的等待之后,马克·波斯特的这本新作终于可以在今年与你们见面了。让我既兴奋又带着些忐忑的心情!

近代翻译家严复对翻译西方著作的标准有著名的信、达、雅“三难”说。而当代著名翻译家林青华更在这“三难”之外描述了当今翻译劳作的“四难”,即所谓:文本文体、文本对话、译者体力和译者身份。当前,我国翻译学术著作的主力军是我们这样的高校教师。几年前,译者接受此翻译任务时,初衷仅是为了自己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明知如此艰巨的翻译工作在高校事关普通教师“饭碗”的所谓晋升职称活动中,根本不能算作任何“科研成果”,但是,我想我们需要这样具有思想智慧开启性的西方“思想活水”,来滋润调理自己和学生日益务实功利的治学思路。所以,译者当时几乎是渴求得到这一任务,然后在工余挑灯夜战,然后孜孜于艰深苦涩的新名词如何更加准确地译介出来,不以为苦,而以终于能比较顺畅地表述一段长句子来体味那一丝成功的喜悦。

非专业人士的诸如本书译者这样的高校教师,匆匆行色中总有些许疏漏,在理解和表达西方新文化理论的时候,错误必定难免。还好,有了一次小小“初试”,就会“难免技痒”的有再二和再三。总之,能奉献一本西方文化理论的好书给你们,希望你们在攻克当今网络文化现象这块璞玉时,手上先有着一块西方文化理论之石,作为参照物,也是我多年来一大夙愿!

目 录

译者序	(I)
第一章 文化的不确定性	(1)
第二章 技术之存在	(22)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语言学转向	(41)
第四章 数字化主体与文化理论	(62)
第五章 模拟作者与数字化作者	(83)
第六章 国家、身份与全球化技术	(106)
第七章 虚拟理论:鲍德里亚和德里达	(133)
第八章 虚拟的种族	(154)
第九章 网络民主:互联网是一个公共空间?	(180)
人名中英文对照	(199)
参考文献	(211)
原书索引	(224)

第一章 文化的不确定性

电子束将铁幕掀开，仿佛它只是一条丝带。

——罗纳德·里根 1989 年在伦敦的演讲

文化与新媒介

文化成了每一个人的问题。在学术上，过去被认为坚不可摧的文化概念如同经历了其后果不可估量的地震一样动摇了。

如今，文化已是一片动荡的领域，上面刻着二十年来各种不得要领的争论留下的烙印。当你伫立在这片土地上，文化问题立刻将你置于各种学术甚至是政治的争端之中。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方便，这有点过于精密了。眼下，凭借“文化”这一小小词语所具有的能量，各种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裂解成为许多富有争议的子群体，它们的学科界限也变得模糊。每个人都企图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个词，然而这时，“文化”就有了新的、无法预见的含义。历史学家正在实践着经验主义的文化历史学(empirical cultural history)，却发现他们正面对着文学批判和理论的冲击。社会学家试图使文化量化，却仅是激发了那些位于对立面的，并且追求微妙、精细意义的人文主义者的抱怨。美学家谴责有人将该词应用于流行文化。人类学家解构“文化”的概念，并将人种学(ethnography)应用于“高级”(advanced)社会，而文化研究的专家则质疑他们的话语能否在这样的部门化分割中得以

幸存。

大量少数民族和亚文化群体举起了文化的旗帜,坚守文化上的认同感。保守派辩称,他们看到的文化,仿佛正经历着共产主义、恐怖主义以及阿拉伯人的袭击。民族文化瓦解为多元。先锋文化被认为是现代的,因而也是怀旧的。青年人的文化并非是简单的背叛,还装饰着社会阶层,他们与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话,并且影响着成年人。性别并不是生理的,而是文化的,附着着张扬文化的人的喜好与品位。最不稳定的群体呼吁要取得文化上的特权地位:比如,边缘文化甚至是难民营文化(摩尔基,1995)正成为其他群体的文化楷模。

文化已经失去了它的疆界。高等的和低等的文化混合在一起。精妙的创意被用于百货商品的包装。文化与自然的分离正成为讨论的话题。科学家在实验室创造动物。大气、水及天空被高科技国家的社会活动所污染。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培育的,故而文化自身应当被认为是建构的而不是赋予的,是历史性的偶然而不是永恒的、确定的。怀疑论者指出,如果一切都是被建构的,那也意味着也许无一事物是被建构的了。如果所有的理论都在一个文化的进程里彰显自身,那么“文化”这个词将失去它的特异性和连贯性。

尽管存在冲突的不和谐音,“文化”这个词对于研究新媒介仍然不无裨益,甚至举足轻重。然而,悖论在于: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概念,那么,新媒介的研究就会由于对手的弃权,而将社会主流团体的文化也纳入其中。在诸多的目标之中,国家尤为希望能优化人口的管理制度,以保障其领土疆域的安全。公司和企业家们最关心的则是获取更多的利润。这些是国家的文化与经济的文化,这是他们典型的姿态与动机。国家和经济组织将这一类目标强加于新媒介,将其视作更便利的执行工具。简言之,他们用媒介文化殖民了新媒介。国家和经济组织将互联网界定为某种对己有用,且可能改善现状,并使之发展得更快速、更顺利的事物。或者相反,这些公共机构也会认为互联网可能中止或妨碍他们正在进行的活动:国家可能受到恐怖

分子在网络上发动的威胁^①，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能受到黑客的攻击。在任一情况下，他们面临的问题与媒介有关：网络将怎样为他们现有的目标带来助益，或者引发危害？即使国家和企业指望从互联网中寻求处理事务的新方法，他们也并没有对建立这些新方法的基础进行过探讨。

只要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媒介性的框架之内，我们就无法质疑它、确定它的局限性或者另找可能与新文化的产生相关的新媒介。这样一来，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就妨碍了对可能拓展文化问题新领域的互联网的研究。

并非只有国家和经济组织才会根据自身文化来研究网络，学术界对某些民主化政治思潮的研究也常显示出类似的冲动。在这个案例中，问题并不完全是媒介的文化（虽然某些时候是这样），更是主体的问题、自我的问题。在一本集体编写的有关“互联网上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书中，编辑波萨·埃博用这样一个问题给该书设定框架：“互联网将创造一个‘网络乌托邦’（Cybertopia），或通过创建一个网络贫民区（Cyberghetto）从而加剧阶级分化？”（1998：9）如果说国家、企业希求互联网能长期确保他们的统治、主导地位，那么如埃博那样的学者们则是在寻找改善附属群体地位的信号。他问道，对根据种族、阶级和性别而划分的各类群体而言，互联网是提升了他们的地位，还是反而使他们更加远离权力中心？在这里，互联网再次被建构为决定各群体命运的工具，正如这些群体自身也正在被建构一样。虽然这完全是一个正统的问题，但并不是当前文化形式的关键。在这点上，埃博和他书中的作者们没有提出另一个问题：互联网将怎样斡旋于现有文化形象的转变？或者，新的文化形式并非必然地提升现有的、正在被建构的群体的地位，但却以一些不可预见的方式改

^① 据《连线新闻》（Wired News）的报道，20个国家试图将互联网阻挡在国境线外，45个国家对互联网进行着严格的审查，而这还是近期互联网“自由”有所进步的情况。（麦克凯比，1999）

变着它们,这种文化形式是怎样显现的?讨论文化与互联网的关系这一问题不无风险,因为要进入一个恰与自我身份有关但又不甚为人熟悉的领域。如果排除这个问题,人们就无法用批判的眼光考察新媒介的政治文化。人们仅仅能提出自身现有的文化特征——种族、阶级和性别,或者市民、管理者和工人——来检验新媒介在提升他们地位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正如他们所认为,也正如事实上就是的那样。这样的一种框架是媒介性的,它并不是以技术决定论的方式,而是以提供鼓励实践的空间使之反过来帮助建立新的主体类型这样一种方式实现的;这样一来,这一框架就系统化地忽略了媒介的构成特质。

也许,批判性的研究采用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回避了互联网的文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并不着力预设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现有状态。此时,互联网的独特性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但它被设定为一种威胁——不是针对某些特殊群体,而是对于普遍的被认为“人性化”的各种交流方式。例如,玛格丽特·莫尔斯(1998)提出:“在交谈中,人对于互惠与‘我’和‘你’在话语中的互逆性有基本的要求——看和被看,认可和被认可,诉说,聆听和被聆听。”此外,“在交谈中被认可为同伴,既是一种人性的需求,又是一种愉悦,即使当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与机器调解或交流的拟态上。”(10,14)莫尔斯继续说道,互联网媒介的机械性这一特质破坏了这些人性需求。她继续着上述的哀叹——互联网促进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但更令她关切的,是互联网侵蚀了“良性运行的社会”的“社会性”(35)。在这位文化批评家看来,互联网动摇了社会,破坏了面对面交流的幸福。人们会自言自语地问,既然人类是多么需要一种亲临现场(的体验),为什么他们还会频频地彼此逃避,埋头于书报,茫然若失地盯着电视,戴着随身听让音乐在耳际轰鸣,梦游般游走,或像着魔般凝视着电脑屏幕上网?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如果假定任何影响到在场(presence)关系的事物与人的状况无关,那么他就无法研究使网络空间变得适宜居住的潜在可能性,他也提不出如何在政治上运用互联网的问题。文

化批评家只有承认互联网的革新性,并检视民主群体如何开发,并在政治上使用互联网以保证它的最佳结构,才能更好地研究网络。(麦克罗比,1994)

研究互联网的文化问题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互联网是如此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从现代社会和此前漫长的年代中习得的认识与经验。时间与空间,肉体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人类与机器——随着网络化的计算机的应用与实践,它们都在各自相互激烈地转换。(克劳,2000)即使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些,并有意识地带着与现实世界中同样的动机,像在现实生活里一样在网络空间中活动,机械调节的中介作用(mediation)仍将毫无疑问地改变人的经验。那么,这文化或网络空间文化又是什么?

不要将该问题用条条框框限制得太刻板,这一点很重要。诚然,网络空间并没有完全与先前的历史割裂。历史学家适时提醒我们,互联网并不标志着文化形成之基本条件的第一次改组(如上面列举的几组相对概念)。从洞穴壁画、烽火信号到书写与文字,意指(signification)系统的关键性转换一直伴随着人类贯穿着过去。在《信息时代:认字、识数和计算机革命》(*Information Ages: Literacy, Numeracy, an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1998)一书中,迈克尔·霍巴特和扎卡里·谢夫曼指明了计算机生成的信息留下的长远的遗产。他们提出,早在书写诞生的那一天,网络化的处理就产生了:将意指转换为信息。他们认为,信息“……在书写给予从经验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精神对象以稳定性的情况下,和书写结合,这样人们就能容易地、反复地接触到它”(30)。因而书写改变了意指的时间与空间,使之更为持久,并使它从空气的共振转变为草纸或木浆纸。它改变了意指与身体、精神的关系,把它从生命的存在中抽象出来,保存进装订好的卷册中。它改变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他认可意指是主体的实践活动,但同时又肯定意指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最后,印刷术出现后,书写改变了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意指需要精细的工艺、大量的资本和集体劳动。

如果霍巴特和谢夫曼能够想到将互联网与早先的意指实践联系起来,他们的见解就不会妨碍我们对网络空间文化新奇性的漏洞进行明确叙述。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寻求指导,以确认互联网的被建构性,并将它和早期的媒介形式挂上钩。单是历史性的理解,可以使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判明对象的轮廓,视其为偶然的、未建立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那些离经叛道的、备受争议的文化历史学家,比如尼采和福柯,他们修正了只看到当下(present)与过去(past)之连续性的历史学家们暗中引入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他们对历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以某种方式将当下与过去连接起来?而这种方式,又切去了关于当下的草率的合理性,他在虑及创新的同时也认可谱系(lineage),在向不可预知的事物开放的同时探求它们之间合理性的联系。

对互联网文化的研究,必须从对人/机器、主体/客体、身体/心智、时间/空间的解析学中尝试寻找主体建构的新结构。这是我在以后的章节中试图完成的,即使不是最终的形式,至少也是一种初步确切并且系统的陈述。但是,我首先要对主体问题详加阐述。因为在考察互联网文化中,这个词也许不再有用。

主体与身份

我们有必要区分这些术语:“个体”、“自我”、“身份”及“主体”。“个体”或许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根据经验给定的、需要各种详尽细节来描述其在特定时空内的参数的空泛术语。类似的,“自我”表示仍然未有定论的关于个体的思想、个性、灵魂、心智。相反,“身份”与“主体”在文化分析研究中正在被赋予更沉重的含义,比前面两个概念包含着更多理论与政治的分量。“主体”被当成“自我”的一种现代形式,这在笛卡儿的理论中被最恰当地表述为“个体”的深层内核,该个体与物质客体分离,同世界拉开一定距离以确保人们的理性活动

能把握事实真理。个体的这一身份为大多数现代公共制度——民主集中制,法律,资本主义经济学,科学,教育——提供了合理性的证明。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存在优先的、普遍的意识,认为个体的这种身份是切实可行的,公民的职责权力、理性经济人或者长期读写教育的争论才有意义可言。当然,这里所有的论述都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层面。故而,“主体”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根基。

当“个体”作为一种文化形象的一致性开始瓦解时,“身份”变成了一个不得要领的散漫概念。“身份”作为一个解析性的术语第一次被正式使用是在20世纪50年代,埃里克·埃里克森(1968)回顾了弗洛伊德主体论,并以更简明的态度来研究“自我”。不同于自主掌控命运的行动者,也不同于进步主义者、人文主义者视野中的主体,埃里克森展现了一个深深为“他/她是谁?”而困扰的个体形象。埃里克森的“自我”,远不同于英雄般的中产阶级主体,他把生命视为不断渡过危机的过程;它形成暂时稳定的自我,但永远面临着分离的威胁。这个不断调整、分裂的自我就是埃里克森用“身份”一词所表示的意义。从而,“身份”成了主体的一个妥协性的形象,这也说明了关于发展的宏大叙事的现代性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检视“身份”与新媒介的关系时,我们有必要记住文化的这一重大转变。“身份”这个术语是对西方文化失败的承认,这个失败记录在20世纪的大灾难中。这是一个拯救并掩盖传统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并且随着无产阶级的消失、消费文化的涌现、电子传媒的传播、欧洲霸权的衰退等的变化,它不断调整以适应这些改变。当这个术语在妇女、少数民族、性取向与后殖民主义等新的社会运动中延续时,它承载着旧有的意义。考虑到主体的形象,被界定为“身份”的个体就几乎不可能是行动者(agents)了。

曼纽尔·卡斯泰斯的著作《信息时代的经济、社会及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清楚地展现了将“身份”这一术语运用于新媒介研究具有的困难。这部三卷本的作品从批判的角度概括了信息社会的总体理论框架。它包含了日本、俄

罗斯等国的案例分析。这里我不陈述这本书^①中的争论,而只着眼于在与信息的关系中,我们应怎样界定主体。当把信息看做社会的主要方面时,卡斯泰斯认识到了理解文化层次的需要特殊需求。事实上,作品的第二卷就是以《身份的权力》(*The Power of Identity*)为题目的。

卡斯泰斯(1997)对身份作如下定义:

至于身份……我理解基于文化品质特征的意义的构建过程……那便是……被赋予超越其他意义来源的优先权。一个给定的个体,或是一个集体的参与者,可能拥有多重身份。身份是参与者自身的意义来源,通过个性化的进程来建构自己……只有当社会的活动者内化它们,并在这个内在化过程中构建其含义,它们才有可能成为“身份”……与角色相比,身份是更重要的意义来源,因为它参与了自我建构和内在化的过程。简单地说,身份构建了含义,而角色构建了功能。我将意义(meaning)定义为社会参与者行为目的的符号化认同(symbolic identification)……在网络社会……对于大多数的社会参与者来说,意义被最基本的身份所构建……那就是跨越时空的自我保留……这项研究接近于埃里克森关于身份的表述……身份的社会建构总是发生在标注着权力关系的情境中。(6~7)

人们可以赞同卡斯泰斯关于身份和角色差异的表述。但他对身份的表述很大程度基于意识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很难解释媒介在建构自我中的作用。不过,当卡斯泰斯着手研究时,问题变得清晰起来。媒介成了群体手中反抗统治暴力“工程”的工具。他写道:

^① 请参看卡斯泰斯的三卷本及斯托德尔在1998年的论述,里面有相关的精彩评论。